

史学新论

# 试论曾国藩的史学思想\*

董根明

**【提要】**曾国藩生平好读书，校勘了大量史籍，对史实、史文、史识、读史的方法以及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等史学理论问题均有独到见解。他提出“顺性命之理论”，认为自然界奇偶互生，阴阳互动，“天道五十年一变”，否定善恶必有报应的天命思想和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论。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他认为富贵功名皆由命定，“七分天意”，要顺天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三分人谋”，需自立自强。曾国藩为人处世多受其资治、经世、修身、避祸和中庸等史鉴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 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4—0140—05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和文学家。曾国藩“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故《清史稿》作者在其传后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sup>①</sup>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桐城中兴的盟主，其理学经世思想和文论对桐城派弟子乃至整个晚清学术影响深远，学界对此多有研究。曾国藩治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他的史论和史学思想。曾国藩为人处世多受其资治、经世、修身、避祸和中庸等史鉴思想的影响，其史学批评理论和历史观反映了晚清士大夫阶层历史观念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性特征，对此，学界鲜有论及。<sup>②</sup>本文尝试从曾国藩的史学批评理论、历史观和史鉴思想等方面对其史学思想予以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 一、曾国藩的史学批评理论

曾国藩一生好读史书，将“读史”列入每  
140

日必修课程。他认为：“学问之道，能读经史为根柢”，<sup>③</sup>《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自诸经外，此数书尤为不刊之典”。<sup>④</sup>曾国藩校勘了大量史籍，对史实、史文、史识、读史的方法以及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等史学理论问题均有独到见解。

曾国藩推崇《史记》，但对司马迁所载史实多有质疑，认为史不足据。“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善福之不足据，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批准号13BZS005）阶段性成果。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7~11918页。

② 目前仅见竺柏松的《曾国藩历史学说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三篇文章涉及其史学思想。

③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0页。

④ 曾国藩：《复莫友芝》，《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9页。

一以寓不得依圣人以为师。”“此外如子胥之愤，屈贾之枉，皆借以自鸣其郁耳。非以此为古来伟人计功簿也。”<sup>①</sup> 曾国藩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批评理论，即史学不是为古来伟人计功劳簿的，史学的价值在于借鉴意义，现代人可以征诸古籍，汲取历史经验，但对具体的史实要慎思而明辨之，不可简单效仿。

在史文造诣上，曾国藩推崇司马迁。他认为“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毗于用奇。”<sup>②</sup> 而“文气迈远，独子长有此。”其《西南夷列传》“通二方，置七郡，叙次先后，最为明晰。”<sup>③</sup>

对司马迁的史识，曾国藩同样是赞赏有加。他认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乃“自秦焚书以后，汉之儒者惟子长与董仲舒见得大意。”读《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赞》“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知子长胸中自具远识。”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智岂可专邪？”“此语是子长识力过人处。”<sup>④</sup> 章学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而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sup>⑤</sup> 由此可见，曾国藩以史文和史识作为衡量史家和史著的标准之一，是不无道理的。

关于读史的方法。曾国藩认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sup>⑥</sup> 读史书贵在持之以恒。在致胞弟的信函中，曾国藩说：“四弟年已渐长，须每日看史书十页，无论能得科名与否，”<sup>⑦</sup> 在致妹夫的信函中，曾国藩劝告对外甥“每日须讲《史鉴》三页，无论能听悟与否，讲之有常，自有进益。”<sup>⑧</sup> 曾国藩认为，读史须“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sup>⑨</sup> 对古代主要史学典籍，曾国藩撰写了大量的读史札记和史论文章，他认为“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读者只有将自己置于

历史的情境，才能唤起应有的历史角色感。如何才能做到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设身处地，不失为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的读史方法。

## 二、曾国藩的历史观

生活于嘉道至咸同年间的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亲眼目睹了清廷饱受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同治中兴的新气象。他提出“顺性命之理论”，认为自然界奇偶互生，阴阳互动，“天道五十年一变”，否定善恶必有报应的天命思想和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论。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他认为富贵功名皆由命定，“七分天意”，要顺天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三分人谋”，需自立自强。曾国藩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生无常的理解，折射出晚清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动。

曾国藩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这就是奇偶互生和阴阳互动：“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自然之理也。”<sup>⑩</sup> “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天地纲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0~131页。

② 曾国藩：《送周苻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③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1~132页。

④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2~136页。

⑤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史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⑥ 曾国藩：《谕纪译》，《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62页。

⑦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5页。

⑧ 曾国藩：《复朱咏春》，《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32页。

⑨ 曾国藩：《谕纪译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38页。

⑩ 曾国藩：《求阙斋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43页。

编，王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致于一之说也。一者阳之变，两者阴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sup>①</sup>

曾国藩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参悟其“顺性命之理论”，否定善恶必有报应的天命思想和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论。面对时局的急剧变动，曾国藩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某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sup>②</sup> 在读《史记》札记中，曾国藩认为司马迁早就对天人感应产生了怀疑，其“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sup>③</sup> 曾国藩出身卑微，可谓布衣封侯，面对天道无常的现实和急剧变动的社会，他将后天的历练和“自立自强”视为改变人生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显然，曾国藩的这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社会发展观和人生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治年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早期洋务派之所以能够将魏源和林则徐等人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其思想源流无疑就是这种“自立自强”。

在对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风俗之形成的理解上，曾国藩认为其主要取决于“贤且智者”的引领作用。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由此，曾国藩认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于是，“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sup>④</sup> 曾国藩所言显然具有忽视民众觉悟和力量的英雄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大异其趣，其立论的基础无论出于封建臣子对皇帝权威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抑或对“一二贤且智者”的渴望和自身的期许，在传统“威权”受到严重挑战的咸同年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

府急需精英力量发挥振衰起弊的作用，应是不争的事实。当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以“一二贤且智者”的姿态起而卫道时，这些举足轻重的汉族地主官僚很快就打破了由八旗子弟一统天下的格局，政治气象也为之一振。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冲击，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朝廷虽式微，但皇威尚存，作为臣子的曾国藩一方面要谨遵圣意，顺性命；另一方面，身为湘军统帅和督抚大员，他必须“替天行道”，有所作为，为皇帝分忧，为家族荣光。“半由天事”的天命思想与“半由人力”的自立自强，构成了曾国藩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曾国藩的历史观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其所反映的矛盾心理和价值冲突，折射出晚清士大夫阶层历史观念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性特征。

### 三、曾国藩的史鉴思想

从《曾国藩全集》（31卷本，岳麓书社2012年版）所收录的奏稿、批牍、诗文（含诗、赋、序、跋、记、传、杂著、寿序、墓志铭和神道碑等）、读书录、日记、家书和书信等文字看，其为人处世多受其资治、经世、修身、避祸和中庸等史鉴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一生戎马，手不释卷，生平好读史书，不仅自己花重金购《二十四史》阅读，还将金陵书局刊刻的《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等寄予众友人，以期“嘉惠士林”。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曾国藩在《加罗忠祐片》信札中指出：“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

① 曾国藩：《送周苻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② 曾国藩：《彭母曾孺人墓志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86页。

③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0页。

④ 曾国藩：《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7~138页。

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sup>①</sup> 读史之目的要有益于资治，这是曾国藩史鉴思想一个重要内容。

咸丰十一年初，针对湖北、山东、陕西、河南各疆臣先后陈奏朝廷，力主迁都长安，以为目下第一良策，曾国藩在《加复方朔元》信函中总结历史经验，大胆陈辞：“鄙意以为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跋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也。”<sup>②</sup>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立，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安，能扶民也。”<sup>③</sup>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完全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迁都与否已无济于事。曾国藩从历史上的多次迁都和汉初与隋末的比较中，得出中兴在于得人，在乎民心所向的历史结论。

曾国藩读史并不拘泥于古代典籍，对当代边疆史地学著作亦很关注。得知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乃“谈夷务之书”，他委托郭嵩焘、郭崑焘兄弟“请代为取出，迅速寄营为感！”<sup>④</sup> 他致信何秋涛，言“其《朔方备乘》之表七卷、图说一卷，国藩思钞一分以启蒙昧。”“兹读凡例，益得仰窥纂述之精。”<sup>⑤</sup> 对冯桂芬所撰《校邠庐抗议》，他赞赏有加，认为该书博古通今，穷极世变，“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sup>⑥</sup>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曾国藩认为：“时异势殊，古法不可施于今久矣。”<sup>⑦</sup> 读史的目的旨在能够经世致用。

目睹西方列强的侵略，曾国藩亦感到切肤之痛，“目前边陲未靖，外患方长。”<sup>⑧</sup> 咸丰十年十一月卅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接江西总局新

刻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sup>⑨</sup> “今朝廷以中外交涉，时艰孔亟，思所以惩前毖后，未雨绸缪。”<sup>⑩</sup> 他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sup>⑪</sup> 曾国藩以“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的务实精神，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想的回归。

对于如何修身和成才，曾国藩亦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sup>⑫</sup> 在自拟《劝诫绅士四条》中，他同样强调：“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sup>⑬</sup> 曾国藩以古训要求子弟，提倡以勤苦磨砺意志，告诫晚辈每日须早起，做

① 曾国藩：《加罗忠枯片》，《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63~664页。

② 曾国藩：《加复方朔元》，《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三》，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46页。

③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0页。

④ 曾国藩：《加郭嵩焘郭崑焘片》，《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三》，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22页。

⑤ 曾国藩：《加何秋涛片》，《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三》，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86页。

⑥ 曾国藩：《致冯桂芬》，《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七》，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53~154页。

⑦ 曾国藩：《先大夫置祭费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93页。

⑧ 曾国藩：《病体垂危谨由梅启照代递遗折》，《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79页。

⑨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⑩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折》，《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70页。

⑪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89页。

⑫ 曾国藩：《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9页。

⑬ 曾国藩：《劝诫绅士四条》，《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49页。

事须有恒，“莫问收获，但问耕耘。”<sup>①</sup>其修身之法和成才之道，是有积极意义的。

曾国藩认为与人共事，要善于领会委曲求全。为人处事，要能屈能伸，刚柔互用，不可偏废。他认为：“天地自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所谓“刚”就是“强矫”；所谓“柔”就是“谦退”。他告诫胞弟们：“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sup>②</sup>

曾国藩布衣封侯，官运亨通，深谙为官避祸之道。咸丰八年三月，他告诫九弟国荃：“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sup>③</sup>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曾国荃申请于钦篆、督篆两席中辞退一席，对此，曾国藩十分赞同：“疏辞两席一节，弟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

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sup>④</sup>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坦言：“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sup>⑤</sup>曾国藩明哲保身，其为官之道虽具浓厚的中庸思想，但他所主张的为人莫傲，为官莫贪，应是前车之鉴，后人之师也。

本文作者：安庆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曾国藩：《联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29页。

② 曾国藩：《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8页。

③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36页。

④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08页。

⑤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14页。

## On Zeng Guofan's Historical Thoughts

Dong Genming

**Abstract:** Zeng Guofan loved reading historical books all his life, and emended a lot of historical books. He had unique understandings of historical facts, articles, knowledge, history-reading methods, thoughts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books, and other problems in historical theories. H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life”, advocating that nature alternates odd and even, that *ying* and *ya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way of heaven has a major change every fifty years”, deny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ory which preached that good and evil would have their respective retributions, and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causation. Facing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unseen in one thousand years, on one hand, he thought that riches and honors were predetermined by destiny, that “70% of one's situ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at one should obey the will of heaven;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thought that “all generals and ministers of a state are not born rich and noble”, and that “30% of one's success is achieved through human efforts”, so that one should be self-reliant. Zeng Guofan's ideas were the outcome of his own historical thoughts such as those on governance, administration, moral cultivation, avoidance of disasters, and moderation.

**Keywords:** Zeng Guofan; historical thoughts